

京華文苑



京華文苑

北京市社會科學學院

《京華文苑》編委會編

文藝藝術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灿炽

封面设计：李吉庆

京 华 文 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京华文苑》编委会编

·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昌平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3毫米1/32 印张18.75 字数450,000

1988年8月北京第一版 1988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039-0214-0/I·136

定价：5.85元

《京华文苑》编辑委员会

主 编：曹子西 马玉田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玉田

王主玉

甘海岚

吕恢文

吕晴飞

曹子西

目 录

文学研究所十年(代序).....	曹子西 (1)
盛唐诗歌与幽州.....	紫 吟 (9)
典型问题.....	田 丁 (25)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谈叙事诗的抒情问题.....	王主玉 (61)
老舍和他的儿童文学创作.....	甘海岚 (73)
大观园的艺术价值.....	曹保泉 (81)
研究人,切莫冷落了马克思.....	马玉田 (109)
辩证思维与文学研究.....	高长印 (127)
鲁迅杂文的思想成就与艺术特征.....	高起祥 (165)
中国古典戏曲创作理论中的艺术禁忌.....	俞长江 (168)
论诗人屈原的改革精神.....	吕晴飞 (178)
一曲祖国的四重奏 ——读王蒙的近作《相见时难》.....	张丽航 (196)
骆宾基评传.....	韩文教 (203)
试论《水经注》的语言艺术.....	李知文 (230)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谈.....	许树森 金 汕 (250)
论“源”与“流”的辩证关系.....	吕智敏 (264)
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关系再探讨.....	孟 固 (291)
综论美国学者的“孤岛”话剧研究.....	张 泉 (300)

创造性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范例

——《管锥编》在古代文献注释领域的方法创新

.....	王 光	(329)
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女作家关露.....	萧 阳	(345)
马致远生平考略.....	李明春	(380)
论郭沫若对新诗发展的独特贡献.....	钱光培	(394)
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东方》 到《地球的红飘带》.....	王文进	(415)
如何评价《猫城记》?.....	吕俊文	(422)
施彦端即施耐庵考论.....	张惠仁	(441)
散文创作漫议.....	马尚瑞	(463)
必要的张力.....	蒋京宁	(489)
论程丙本.....	周 雷	(507)
生命的暗影与文学的光辉 ——新时期十年文学随感之一	张东明	(540)
文学研究会作家群早期创作中 “爱与美”的倾向及其发展.....	王桐宜	(550)

文学研究所十年（代序）

曹子西

1988年8月，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立十周年的日子。我们从十年来文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中，每人选取一篇论文，有的曾经公开发表，有的是尚未发表的新作，编辑了这部集子。从中可见十年来他们垦拓过的领域，也是为了回顾一下文学研究所的十年历程。

—

十年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筹备、创建的时候，原称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1978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正式建立，下设哲学、经济、历史、文艺理论四个研究室，并明确提出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围绕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开展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从1978年春到1979年底，全所调集了研究人员四十余名。其中，从事文学专业研究的仅十来人。这应当说是文学研究所的种子，是最初酝酿、准备的阶段。

1980年以来，文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迅速扩大，组织机构逐步健全，科研方向初步明确，学术活动相继展开。全室划分了文艺理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资料编辑等几个专业小组，并且组成了以业务领导为主、党组织密切配合与保证监

督的文学研究室领导班子。

1981年春，经全室人员反复酝酿和研究讨论，确立文学研究室的科研方向，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思想和北京地区的文艺实际为主要任务；把历史的研究同现实的研究、理论思想的研究同创作实践的研究结合起来；立足北京，放眼全国，兼及国外，力争早点拿出具有一定质量和北京特点的研究成果。同时，确定研究重点要抓住两头，一头是学习、研究理论，组织力量写一部以研究、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文艺理论专著；一头是收集、整理北京地区当代文艺资料，每年编一部《北京文艺年鉴》。还提出，要关心注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实际问题，深入展开学术上的自由争论，积极参加社会上的学术活动，及时掌握国内外的文艺思潮、信息和动态。

从1980年到1983年，文学研究室基本上按照上述计划，逐步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四年，可以说是文学研究所的种子萌芽、成长并初步取得成果的开创阶段，也是文学研究工作开展比较迅速的四年。到1982年底，文学研究室即达二十七人，这是至今我院文学专业研究人员最多的一个时期。

1984年至1985年4月，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整党告一段落，全体研究人员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在科学研究上努力追求的愿望十分强烈，大家提出许多积极可行的改进工作的建议。所领导研究了这些意见，逐步调整并加强了科学研究的业务管理。1986年4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改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也改称文学研究所。从1984年至1988年，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研究人员增加了，个人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经过1984年和1985年两年多的长期酝

酿，将文学研究所的科研方向进一步调整为“密切结合我国特别是北京的文艺发展实际，开展研究工作。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服务、为促进首都文艺学术领域的繁荣和发展服务”。科研重点是：一、社会主义文学规律研究；二、北京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三、北京戏曲和影视艺术研究。研究机构的设置是：文艺理论研究组、北京文学研究组和北京艺术研究组。全所现有研究人员二十六人。

二

十年来，经过大家的刻苦钻研和奋力拼搏，文学研究所先后完成了一批学术成果。

属于文艺理论专著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有田丁、马玉田、王主玉三人合作、分别执笔的专论小册子《艺术典型新议》、《艺术真实十题》（1983年均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以及《论共产党员文艺家》（1984年载院内刊物《文稿》）等。同时，全所人员完成了一大批专题论文，经筛选后，于1982年、1983年先后编成《创作与鉴赏》（1983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作家与作品》（1984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两部文集，共收论文36篇，40余万字。这两部文集的特点是，比较集中地研究了文艺理论的现实问题，以及活动在北京地区历史上和当前的一些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王主玉同志为编选这两部文集，花费了很多精力。近年来，参加当前文艺思想讨论的专文有：马玉田的《研究人，切莫冷落了马克思》、钱光培的《处在两峰之间的文学》，等等。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有曹于西的《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1983年修改重排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钱光培的《现代诗人朱湘研究》（1988年燕山出版社出版）、张惠仁的

《臧克家评传》（1987年能源出版社出版）、马尚瑞的《从学徒到诗人——阮章竞简传》（1986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汤浩的《关露传》、韩文敏的《骆宾基评传》，以及甘海岚的《老舍年谱》，等等。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有吕恢文的《诗经国风今译》（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知文的《水经注选注》（与谭家健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吕智敏的《李清照诗词评注》（与侯建合作，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周雷的《红学丛谭》（与胡文彬合作，198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保泉的《红学散论》（与顾平旦合作，198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等。同时，还公开出版了多种编选、选注、赏析等中外文学名著读本和资料工具书。高起祥、吕晴飞、俞长江合作的《写作语林》（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吕晴飞的《新诗用韵手册》（1987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等工具性撰著，在读者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系统地收集、整理北京地区的文艺资料，以文学研究为基础，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了北京文艺年鉴编辑部，1980年着手文艺年鉴的编辑工作。有文学研究室全体人员参加，由曹子西、田丁主持编纂的《北京文艺年鉴》三部，1981年卷由工人出版社出版，1982年卷、1983年卷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1984年组稿后，由于计划改变，编选了一部《1984年文学作品精选》，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北京文艺年鉴》虽然只编印了三个年头就夭折了，但它确实认真收集、整理和保存了北京地区的当代文艺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以及一些文艺界人士的欢迎。汤浩、许树森、王文迎、金汕以及文学研究所其他同志都曾为《年鉴》付出过艰辛的劳动。王文迎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志，为了解决《年鉴》出版、印刷问题，她同金汕一起南下常州，

西上太原，多方联系，到处奔波，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从1980年至1983年，文学研究室还编印了供内部参阅的《文艺动态》20期，共计10余万字；试办了铅印16开《文艺信息》小报8期，共30余万字，颇受所内外读者欢迎。遗憾的是，收集、整理文艺信息、资料的工作，自1984年起就中断了，这是当前需要抓紧补救的一项重要工作。

文学研究所在学术活动方面也比较活跃。1980年12月，同各高等院校文艺教学工作者、报刊文艺编辑工作者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市文艺学会。文艺学会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所内的同志承担。1981年举办了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了《鲁迅研究论文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举办了鲁迅作品的系列讲座，由文艺学会编印了《鲁迅作品选讲》的集子。1982年上半年，组织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讨论会。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和毛泽东诞辰90周年，先后举办学术讨论会，由文艺学会编印了纪念性的《文艺论文集》。还同北京市文联研究部联合召开过一些关于文艺思想与作家作品的小型学术研讨会。1987年初，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联合召开了关于当前文艺思想问题的专题讨论会。1987年5月，北京市文艺学会又同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5周年学术讨论会”，等等。总之，文学研究所是活跃在首都文艺学术论坛上的一支新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这样一个单子，尽管很不完全，有些著述的质量、水平也不够高；但它的确是文学研究所每一位同志脚踏实地、探索前进的足迹，是我们的同志用自己的心血浇灌起来的一株草、一朵花和一颗果子。它不是梦境中的“神来之笔”所点化的幻影，也不是什

么自由自在、自发追求所炼就的“知识富翁”。我们觉着，只要是把科学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资料基础之上，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研究目标，在社会主义的坦途中，依靠个人独立刻苦的钻研和社会集体的热情支持，插上学术自由讨论的双翼，就可以起飞。今天飞得可能还不够高、不够远，明天就会飞得高一些、远一些。一个课题是如此，一个人的科研成就是如此，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单位也是如此。

三

文学研究所的十年，是拓垦的十年、成长的十年，也是探索前进的十年。

十年来，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单位，首先必须要有能够动员、组织大家做出科研贡献的明确的主攻方向。科研方向，不是由哪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动听词句，也不是炫耀门面的时髦招牌，而应当是经过全所研究人员的充分酝酿和讨论，根据自身的条件（思想准备、学术准备和资料准备），从本学科专业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实际需要出发来确定的。明确了科研方向，还必须提出切实可行的重点研究课题，合理组织研究力量，才能坚持并使之落实。否则，这个方向就只能还是一句空话。文学研究所早在1981年前即曾初步明确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并定出重点课题，也做出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成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中断，有的夭折，这是应当记取的教训。

其次，文学研究所的人员力量和学术水平比较均衡，从一个短的时期来看是有优势的。但从全所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来说，从较长时间的发展来看就还不尽理想。这主要是中年研究人员过于集中，而全所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又太少，受过专业研究

生训练的就更少。这给研究力量的合理组织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一个研究所，要有合理的人员结构。一是学术水平、研究能力的合理结构，一是年龄层次的合理结构。我们体会到，比较理想的结构最好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这样，可以组成主次分明的研究集体，也便于在科研攻关中培养人材和筛选人材。缺少“尖子”人材和后备力量，是不利于科研攻关的。那种认为“科研无须攻关”、“人材不必培养”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再次，要注意培养、选拔学术作风正派，有群众基础而又肯于献身科研事业的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们不可能自发地形成，也不可能由谁来自封。这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又为群众所承认的。科学研究是一项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工作，需要的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精神，来不得半点虚假或投机取巧。学术带头人要率领大家在科研工作中攻关，研究人员要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左顾右盼，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拉拉扯扯，等等，都只能带来科研事业的损失和衰败。任何研究课题都必须建立在个人独立钻研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任何贬损个人钻研的劳绩、挫伤个人科研积极性的想法和做法，也都是不可取的。同时，任何个人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脱离历史基础、客观条件和社会集体。谁摆不正这个关系，谁即将陷于绝境。从这些年的实践中，我们觉着应当这样认识，但做得却很不够。

最后，从文学研究所的实践中体会到，必须形成学术领导和行政、思想政治工作协调一致、团结合作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一点，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出成果、出人材。哪个单位、什么时候领导班子团结得好，密切联系群众，其科研工作就发展得顺利；否则，精力就会内耗在人际关系的扯皮和矛盾中。文学

研究所的领导班子一直是团结的，而且互相配合得也比较好。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原来的所领导成员先后调离，工作一度有所削弱，但经过实际锻炼，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以后，很快就适应了工作。

这些话，几乎都是老生常谈，但在一个单位、一个时期的工作中却有着活生生的具体内容。在回顾文学研究所十年历程的时候，我想到这些，无非是希望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奋进！我相信，他们在第二个十年中，能够拿出更多更好更有社会影响的科研成果。把这种心情写出来，姑且充作这部纪念论文集的序言吧！

1987年6月草于屯溪

1988年4月定稿北京

盛唐诗歌与幽州

紫 兮

—

唐代诗歌，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黄金时代，是祖国文学遗产宝库中最珍贵的部分之一。不少著名的唐代诗人，留下了许多抒写幽州的优秀作品和千古名句。幽州的社会生活现实，丰富了诗人的艺术感受，激发着诗人的创作才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成长。

幽州于隋朝（公元581—618年）末年改称涿郡，唐朝（618—907年）初年又改涿郡为幽州。州置总管府，领县有：蓟、良乡、安次、涿、固安、雍奴（后改称武清）、昌平、怀戎、潞、渔阳等，州郡治所均在蓟城（今北京市区西南广安门一带），因之蓟城亦称幽州城。当时的幽州城既是北方军事重镇，又是江南、中原和华北通往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贸易经济中心，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封建城市。

幽州地处华北平原的北端，土地富饶，川泽通畅；东北有燕山山脉形成的榆关、卢龙塞，北有居庸关为天然屏障。隋唐兴盛时，中原王朝总是把幽州作为攻略东北的前进基地。隋炀帝先后三次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这里都是兵马粮饷的集结地。唐太宗也曾亲自率领大军从蓟城出征，直赴辽东。但当中央势力衰败，北方游牧民族伺机而动，觊觎中原时，这里又成为军事防守

重地。公元712年，李隆基（唐玄宗）即帝位，相继于北部边区分设八个节度使，兼统军政、民政、财政大权于一身。蓟城即是幽州（后改称范阳）节度使的驻地，足见其防御地位的重要。使唐代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安史之乱”（755—763年），也由身兼范阳、平卢（治所在今辽宁朝阳）、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从蓟城发难，直下洛阳和长安，延续达八年之久。此后，幽州地区长期为藩镇势力所盘踞，实际上处于割裂的局面。

隋朝只存在三十八年，隋炀帝驱使全国民力，自榆林至涿郡开御道，长三千里，广百步，又历时六年凿通了南起余杭（杭州）北达蓟城的大运河，这对后世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却都产生着极为深广的影响。至唐代，幽州地区的农业已有大规模的发展，土地普遍开垦，到处整治出沃野良田。贞观十三年（639年），幽州献嘉禾，一茎九穗，州府置仓贮粮，以备荒歉。这里的开采、冶炼和纺织等手工业愈加扩大，工艺技术日益精湛。开元、天宝年间，幽州编户人口已达三十七万以上，民户六万七千余户。出产的绫、绢、锦等丝织品相当有名，成为贡品；每年组成车队，满载本地征调物资，运往长安。车队首尾相连，聚集于潼关口，等待过关，给目击者以深刻印象。可见，幽州地区殷富，为开元盛世重要财源之一。

当时幽州城墙高大，周长三十二里，开十门。城内有经略军街、燕州街等通衢大道，并划分为蓟门坊、燕都坊等二十六坊（住宅区），坊内有闾巷。城区北部设固定的商业区和手工业区，称幽州市。作坊店铺，兴旺发达，见于记载的即有各种行业达三十来种。城区附近也有开发，隋僧静琬曾在周口店西南的白带山，主持雕刻石经，开凿洞穴，藏经于洞。唐代又在其地建云居寺，并继续刻经。现存经石一万四千余块，成为极珍贵的历史文物。

幽州蓟城当时所处的地位，及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使之成为唐代开国之后尤其是盛唐时期各诗歌流派、诗人关注的重大现实题材之一，李白和杜甫是如此，陈子昂、张说、王昌龄、王维、高适等也莫不如此。他们或者由于怀才不遇，向往军旅生活，希望在幽蓟边地有所作为，而写下不少感怀、抒情之作。也有的长期在这里居留，幽州的生活、风光，开拓了诗人的视野，奠定了创作的基础。但更主要的是，幽州蓟城在“安史之乱”前后，直接影响了全国政局的变化，影响着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因之同人民群众或多或少有着联系的诗人，不能不把自己的关心，倾注到这里。

二

在唐代诗坛上，到过幽州并借以抒发胸怀的著名文学家和诗人，当首推陈子昂（661—702年）。他的《登幽州台①歌》仅四句，计二十二个字，读来慷慨悲怆，寄托恢宏而寓意深远，成为传诵至今的名篇。其歌曰：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当时，陈子昂随军击契丹，至东北边陲，这首诗就是他逗留幽州城时，有感于战国时期燕昭王和乐毅、邹衍的故事，自伤际之作。他在《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的诗序中说：“丁酉（697年）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其中两首这样写道：

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空黄埃。